

中国少数民族简况

维吾尔族 塔吉克族
乌孜别克族 塔塔尔族

(征求意见稿)

542 31

51.34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编

662

26

江蘇工業學院圖書館
民族克剌
藏書章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目 录

维吾尔族.....	(1)
塔吉克族.....	(26)
乌孜别克族.....	(35)
塔塔尔族.....	(39)

维 吾 尔 族

维吾尔族共约五百万人（1974年），约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人口的二分之一，其中80%聚居在新疆的和田、喀什、阿克苏和库尔勒四个地区，其余散居在新疆各地。十三世纪时有维吾尔族二十九姓迁往内地。现湖南桃源、常德县有维吾尔族二千余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我国最大的省（区），面积一百六十余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国境线绵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除维吾尔族外，还有汉、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塔吉克、锡伯、满、乌孜别克、塔塔尔、达斡尔、俄罗斯等族。

群山怀抱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有阿尔泰山，西有帕米尔高原，南有喀喇昆仑山和阿尔金山。横亘中央的天山将新疆分为自然景色各异、风貌迥然不同的两部分。天山南麓有塔里木盆地，盆地中央是我国最大的、维吾尔语意为“进去出不来”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天山北麓有孕育克拉玛依油田的准噶尔盆地和宽阔、富饶的伊犁河谷地。天山东端有我国最低洼、位于海平面以下的吐鲁番盆地，这里出产的无核葡萄和哈密瓜远近闻名。高山融雪是新疆河流的源泉。世界上最长的内流河塔里木河和叶尔羌河、玉龙喀什河、车尔臣河灌溉着塔里木盆地四周肥沃的土地，伊犁河、额尔齐斯河、乌伦

古河及玛纳斯河哺育着北疆广阔的田野和牧场。许多内流河的下游淤为湖泊，如罗布泊、博斯腾湖、布伦托海、艾比湖等盛产鱼类和芦苇。新疆是大陆性气候，南疆干旱而温暖，有“塞外江南”之称，北疆较为寒冷，雨雪充沛。在盆地边缘的沙漠和戈壁开发绿洲是维吾尔族农业的特色。小麦、玉米、水稻是新疆主要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解放以后，玛纳斯河流域垦区开创了北纬四十度以上植棉的新记录。新疆是我国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天山有蕴藏量极大的煤和铁，阿尔泰山以盛产黄金著称，昆仑山的和田玉自古有名，还有各种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绵延千里的油田、森林和亟待开垦的可耕地。

(一)

自古以来，新疆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祖国边疆，与祖国内地各族人民有着极为密切、频繁的经济文化联系。新疆古称西域，在汉文古籍《尚书》、《山海经》、《吕氏春秋》中都有关于新疆的记载。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进一步沟通从我国到中亚一带的“丝绸之路”。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西域都护府，统辖“三十六国”。东晋设高昌郡。唐代设安西、北庭都护，下辖府州。元代在天山南北置“行尚书省”，设“达鲁花赤”。明设哈密卫。清初行军府制，设伊犁将军，1883年新疆建为行省。

“维吾尔”是民族自称，意为“团结”、“联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汉文史籍曾有“袁纥”（北魏）、“韦

纥”（隋）、“回纥”、“回鹘”（唐、宋）、“畏兀儿”（元、明）等不同的音译。

维吾尔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族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游牧于我国北方和西北贝加尔湖以南、额尔齐斯河和巴尔喀什湖之间的“丁零”（“丁灵”、“丁令”）和公元四、五世纪时的“铁勒”（“狄历”、“赤勒”、“敕勒”）。

“铁勒”是“丁零”的音变，由于这些部落使用的车轮高大，又被称为“高车”。

七世纪时，“铁勒”中的“韦纥”、“仆固”、“同罗”、“拔野古”等部因抵抗突厥的压迫组成了“回纥”部落联盟。统一九姓铁勒诸部的第一代回纥可汗受唐朝册封，此后回纥与唐朝一直保持友好和从属关系。唐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回纥可汗上书唐朝，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改回纥为“回鹘”。九世纪中叶，回鹘为黠戛斯所灭，分三支西迁。迁吐鲁番盆地的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击败吐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迁葱岭西楚河畔的称“葱岭西回鹘”，与当地突厥语部落会合，十世纪时建立了哈拉汗国；还有一支迁河西走廊，称“河西回鹘”，其后裔是裕固族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昌回鹘与葱岭西回鹘进入新疆以后，与两汉以来移居这里的汉人、分布在天山以北和西部草原游牧的突厥语部落和原来就居住在南疆广大地区操焉耆、龟兹、于田语的人民以及后来不同时期迁来的吐蕃人、契丹人、蒙古人长期相处，蕃衍发展，逐步形成维吾尔族。这一时期是维吾尔族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从九至十二世纪，回鹘社会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游牧的畜牧业逐渐转向定居的农业，回鹘地区与内地的商业贸易空前繁荣，封建制

度进一步确立。伊斯兰教的传播逐渐取代了回鹘人原来信奉过的萨满、摩尼、景教、祆教（拜火教）和佛教。兼有汉族和西域特点的回鹘文化高度发展，表现在用回鹘、汉、梵、萃利、吐火罗、婆罗谜等多种文字和历算、绘画等方面。这个时期，南疆地区形成了维吾尔两大文化和文学中心，即北部的吐鲁番（包括天山以北的别失八里）和南部的喀什，产生了大量文献，包括行政公文、文学创作、宗教典籍和民间契约等，是研究维吾尔族历史和语言文化的重要材料。

十二世纪初，契丹灭哈拉汗国，建立哈喇契丹国（黑契丹），史称西辽，高昌也沦为其属国。蒙古兴起后，现新疆大部分地区属察合台汗国领地。维吾尔族对元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有重大的影响。当时，许多维吾尔人入仕元朝，受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文学家、史学家和翻译家。如最早的蒙古文就是采用回鹘文字母制定的；流传于明代的“海盐腔”是著名的维吾尔文学家贯云石在曲艺上的创作之一；辽、金、宋史的修纂都有维吾尔人参加。

从十四世纪末到十六世纪末，东起哈密、南至和田的广大维吾尔族地区，经过二百多年的分散割据，才逐步统一成更大范围的封建割据的喀什噶尔汗国，因迁都叶尔羌又称叶尔羌汗国；统治者仍是蒙古察合台后裔。清初，叶尔羌汗国与清朝建立了朝贡和通商关系，维吾尔族和内地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继明代的时疏时密之后又趋于正常化。由于代表不同地方封建集团的“黑山”、“白山”两个教派争权，北疆的蒙古准噶尔部趁机灭叶尔羌汗国，统治了维吾尔族地区。在蒙古和本民族封建主的双重压迫下，维吾尔族人民受到十分残酷的剥削和统治。准噶尔汗曾几次将南疆的维吾尔族农民强迫迁至伊

犁垦田纳税，并加强了原有的、适应封建农奴制需要而建立的伯克制。1755年，清朝为消除西北边疆的隐患，平定了准噶尔，又灭了图谋叛清“独立”的巴图尔汗国。此后，为加强对新疆的统治，分别采用郡县制、扎萨克制和伯克制。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以由朝廷任免的各级伯克代替了原来的世袭制，削弱了封建地方势力，从而促进了封建农奴制的解体。此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如兴办屯垦，举办商业，降低税率等，在客观上对维吾尔族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新疆完全处于清朝的直接统治之下，虽然政治制度的变革使封建伯克的政治、经济特权受到一定的限制，赋税也减轻了，然而各族劳动人民的处境并没有根本改变。清朝派驻新疆的大小官吏通过各级伯克肆意向维吾尔族人民派捐派款，按丁索赋，甚至“课及园树”。伯克则私自增加占有土地和农奴，把持水利，操纵粮价，极尽搜刮之能事。广大维吾尔族人民在日益沉重的封建统治和剥削之下，忍无可忍，纷纷奋起反抗。1765年乌什起义是维吾尔族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反封建斗争，起义群众杀死“阿奇木伯克”及乌什办事大臣，屡败清军，坚持半年之久，迫使清廷不得不作一些让步。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维吾尔族封建主为了维护其统治和达到推翻清政府的目的，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利用教派斗争掩盖阶级矛盾。1820年，受英帝国主义唆使，南疆维吾尔族反动封建主的代表张格尔，以宗教旗帜为掩护，由英帝国主义提供武器和直接指挥策划，发动了叛乱，控制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四城，建立了傀儡政权，后在清军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击

下，张格尔和英帝国主义的阴谋遭到可耻的失败。

(二)

近百多年来，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奴役和压迫的苦难。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首先是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新疆自由贸易、货物免税、领事裁判等特权，英帝国主义也接踵而来。帝国主义在新疆的重要城市开商埠、划“贸易圈”（租借地），低价收购羊绒、羊肠衣、溜胎羔皮、生丝、白银等农畜土特产，推销布匹、呢绒、绸缎、皮革制品、火柴、糖等洋货和鸦片，使新疆成为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市场。帝国主义发行货币，垄断新疆的金融和财政，控制海关、邮电、交通等事业为他们的经济侵略服务；还不断派遣所谓“考古队”、“探险队”、“传教士”、“医生”进行文化侵略。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御用学者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等劫掠了新疆地区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并收集情报为帝国主义侵略新疆提供资料。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早已虎视眈眈，觊觎我国神圣领土。十九世纪中叶，英、俄帝国主义在中亚争夺殖民地，继而图谋瓜分中国。1865年，英帝国主义扶植浩罕国的反动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建立反动的“哲德沙尔汗国”（七城汗国）。阿古柏是英帝和沙俄侵略、瓜分新疆的走狗，无耻地臣服英帝及其附庸土耳其，促使新疆沦为殖民地，同时施行中世纪伊斯兰教汗国野蛮、暴戾的统治，使新疆各族人民

的生活陷于绝境。沙俄为了保持在中亚的既得利益，与英帝保持均衡势力，于1871年以“代收代守”为名侵占伊犁。新疆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彻底摧毁阿古柏政权、收复失地是新疆和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1877年，清军由于有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协助，取得了征讨阿古柏的胜利，维护了祖国的统一，粉碎了英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在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下，清朝不得不对沙俄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1881年，改订伊犁条约，虽然收复了伊犁一地，但仍失去霍尔果斯河以西之地、赔款九百万卢布。1883年，新疆建省，这一措施对于巩固西北边疆，防御帝国主义侵略，开发新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在帝国主义和本民族封建统治阶级造成的战争灾难中深感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危害。建省以后，新疆与内地的关系更加密切，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愈益团结一致。1933年英帝国主义策动大土耳其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成立和田伊斯兰教共和国，大伊斯兰主义分子萨比提达毛拉拼凑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教共和国，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发动马木提、尧乐巴斯组织所谓“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家，马木提又勾结马虎山共同叛乱，都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击，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在清朝直接统治新疆的一百多年中，继乌什起义之后，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十九世纪中叶，在太平天国、捻军和云南、陕西、甘肃各族农民武装起义的影响下，1864年库车的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民首先发动武装暴动，乌鲁木齐、莎车、伊犁各地各

族人民也纷纷响应，反清风暴席卷天山南北，新疆几乎全部为武装暴动群众所占领，震撼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二十世纪初，哈密维吾尔族人民反抗维吾尔族封建主的繁重徭役和民族压迫曾在1907年和1931年两次发生暴动。这几次规模较大的以维吾尔族、回族和各族劳动人民为主力军的自发的农民武装暴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和削弱了反动统治势力。但是，“民族”的、“宗教”的口号转移了群众斗争的目标，以致人民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最终被一小撮封建和宗教上层所篡夺。

辛亥革命以后，清朝在新疆的统治被封建军阀所代替，杨增新、金树仁、马仲英等军阀混战连年。1933年“四·一二”政变，投机分子封建军阀盛世才伪装进步攫取了统治新疆的大权。各地民族斗争和军阀内讧、帝国主义侵略等错综复杂的动荡局势，使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三)

1933年，正在我国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在新疆的革命活动，领导新疆各族人民为争取和实现和平、民主、进步而斗争。1935年，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各族人民的强烈要求，迫使盛世才不得不采取一些进步措施，提出了“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等六大政策。同年，成立了群众性的反帝斗争组织“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出版了刊物“反帝战线”。1937年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进入新疆，翌年，党中央、毛主席

先后派遣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到新疆，根据抗日战争十大纲领积极开展工作。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克服重重困难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疆广为传播。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在新疆出版。党在新疆地区的工作使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学习到革命的真理，也使各族人民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1942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盛世才彻底暴露了反动的真面目，公开投靠了国民党。新疆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爱国青年和无辜的劳动人民遭到残酷的迫害。以陈潭秋同志为首的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投入监狱，革命先辈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洒尽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党对盛世才伪装进步的投机性是有所觉察的。当时党在新疆工作的领导同志曾对盛世才作过如下评语：“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即又蠢又狠之意）。”历史已完全证验了这个真理。1944年，国民党反动派直接统治新疆，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又陷入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重重的苦难深渊。国民党在政治上，施行史无前例的高压政策，进驻新疆的匪军人数骤增至十万。并强制推行反动的保甲制度，建立“自卫团”，镇压各族人民。维吾尔族地区原有的“伯克制”在辛亥革命以后虽已废除，但许多由“伯克”转化而来的地主仍然是政治上的当权派，他们成为国民党的帮凶，为虎作伥。封建豪绅集团又与伊斯兰教上层密切勾结，操纵基层政权。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城乡，宗教法庭是执法机关，权限之大是信仰伊斯兰教各族中仅有的。在“不可亵渎的真主”面前，也没有穷人和巴依（财

主)的平等。劳动人民蒙冤受屈，惨遭鞭笞、断肢、油烹等酷刑的蹂躏。教权与政权的结合从生活上、精神上奴役着维吾尔族人民。

国民党反动派对维吾尔和新疆各族人民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苛捐杂税达数十种之多，农民每年交纳的仅土地税一项就占全年收入的15%以上，各族人民平均纳税金额比1937年增加了七倍。从1933—1943年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十年努力而开始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几乎摧残殆尽。在农村里，维吾尔族封建统治集团以国民党反动派为靠山，更加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

辛亥革命以后，维吾尔族地区封建农奴制逐步被地主经济所代替。在南疆维吾尔族农村，大部分地区占农村人口8%的地主、富农占有40—50%的土地，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农民只有少量土地，甚至完全没有土地。“伙种”对分是最普遍的土地剥削形式。农民“伙种”地主的土地只能得产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还要扣除籽种、替地主交纳田赋杂税，而且每年要额外给地主劳动三、四个月，妻女也同时供地主使唤。“伙种”的农民除有人身自由之外，和农奴没有什么差别。在墨玉、库车、阿克苏等偏僻的乡村，还保留有完整的农奴制。占有大量土地和各种手工作坊的农奴主自称“和加”（圣人的后代），对占有的农奴有生杀予夺之权，可以随便买卖、赠送。农奴按等级分给份地，每户农奴每年需有二至四个男女劳动力为农奴主服无偿劳役。在靠近城镇的地区，为了经营方便，地主阶级已采用高额的实物地租剥削农民。许多丧失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农民沦为雇工，备受歧视和虐待。还有所谓养子长工、赘婿长工，实际上是变

相的奴隶。由于南疆绝大部分耕地都靠天山雪水灌溉，垄断水源、把持管理水利特权的地主阶级又以水租对农民进行剥削。地主阶级不仅千方百计地克扣农民的用水量，强制农民承担沉重的水租和兴修水利的劳役，将几十种以占有水量大小计算的苛捐杂税转嫁给农民，甚至恶毒地破坏水源，使农民的庄稼活活旱死，以达到其兼并土地的罪恶目的。

维吾尔族地区的清真寺都有“瓦甫”地（宗教土地），掌握在少数宗教上层手中，与世俗地主一样进行封建剥削。根据教规，寺院向教民征收名目繁多的课税。最普遍的是向农民征收税率为全年收获物十分之一的“吾受尔”粮，和向牧民、商人、手工业者征收税率为全年产品四十分之一的“扎卡特”税。此外，维吾尔族人民买卖房屋、田产、典押、借贷、继承、遗嘱、诉讼等都要交纳课税和手续费。人数众多的宗教职业者不事生产，全靠劳动人民供养。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新疆的时期是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历史上极其黑暗的时期。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使新疆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和横征暴敛使各族人民民不聊生。

1944年，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爆发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与美、蒋特务、匪徒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乌斯满及与民族分裂主义特别是大土耳其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纠正了革命初期在路线、方法及民族问题上存在的严重缺点和错误，明确了革命的对象，斗争形势更加有利，使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受到沉

重的打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从1944年开始延续到1949年的“三区革命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它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并在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下促成了新疆的解放。

(四)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维吾尔族人民受压迫、被奴役的苦难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彻底砸烂封建枷锁，解放农村生产力是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是维吾尔族贫困、落后的根源。解放前，维吾尔族农业生产水平十分低下，工具缺乏，在生产中不可缺少的砍土镩三、四户才有一把，许多地方还使用木犁，粮食亩产平均不过百斤左右。维吾尔族人民勤劳、智慧，在生产斗争中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如吐鲁番盆地气温高、蒸发量大，利用地下水修建“坎儿井”灌溉法是因地制宜的独特创造。但是，万恶的封建制度使农民既无能力也没有可能改变生产落后的状态。维吾尔族地主阶级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为了逼租逼债，在地主庄园里都设有拷打、关押农民的刑具和牢房。北疆伊宁县吐鲁番圩子一个恶霸地主门前的老榆树上，吊打过一百五十多个贫苦农民，其中十六人被活活折磨死。这棵“血泪树”就是维吾尔族劳动人民苦难和仇恨的见证。

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1952年维吾尔族地区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民主改革。在减租反霸的基础上，通过充分发动群众，并根据新疆民族较多、宗教影响较深、土地关系复杂的

社会历史情况制定了具体政策，在全新疆四百万人口的农业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取得了废除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制度的伟大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关怀维吾尔族人民，1952年疏附县色满区帕哈太克里乡土改后的翻身贫下中农，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向毛主席献了长诗，倾吐他们翻身后的激情，毛主席写信给他们，鼓励他们：**“在爱国丰产的口号下，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毛主席的亲切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维吾尔族农民，土改后第一年，新疆粮食产量就比1952年增长了90%，农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开始出现。

在我国农村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激烈的斗争中，维吾尔族农村也出现了极为复杂的形势。1955年，毛主席在痛斥刘少奇等叫嚣在少数民族中不能实现合作化的谬论时高度赞扬维吾尔族贫下中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介绍帕哈太克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文章写的按语中指出：**“维吾尔族的农民，对于走合作化道路积极性是很高的。”**毛主席热情地支持了少数民族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维吾尔族贫下中农不怕富裕中农讥笑合作化是“沙子不会开花，骆驼长不出马尾巴”，坚决顶住了右倾机会主义妖风。1957年春，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胜利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一百多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休戚相关。在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风暴雨中，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更深刻地体会到只有各族劳动人民的紧密团结才能使社会进步和发展。按照新疆各族

人民的共同意愿,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1955年10月1日正式成立。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在多次批判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彻底揭露和粉碎了一小撮敌人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更加提高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毛主席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的光辉思想哺育着民族干部的成长,解放以来,新疆已有维吾尔族和各民族干部十万多人战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

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照耀下,1958年,广大维吾尔族农村掀起了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 生产 高潮,打破了合作社的界限,经过一年的时间,自治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钢铁、纺织、汽车修配、农机等第一批现代化工矿企业也开始建立起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广大战士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的教导,将节约的资金用于工业建设,加速了新疆工、农业跃进的步伐,结束了新疆不能生产一斤铁、一寸钢的历史。

六十年代,维吾尔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全面跃进。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并肩守卫在反帝反修前哨的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齐心协力建设着社会主义的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仅早已超过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而且越来越好。

喜看今日塔里木,林茂粮丰景色新。维吾尔族农村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气象。早在土地改革时,许多维吾尔族贫下中农就从柳条编扎的泥墙小屋搬进了新房。大跃进以后,维吾尔族新农村象雨后春笋般地建设起来。传统的维吾尔族房屋是